

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文化贸易的影响研究

——基于出口二元边际视角

杨连星¹, 沈超海², 牟彦丞¹

(1. 华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上海 200261; 2. 华东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上海 200261)

摘要: 中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影响。围绕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这一重要命题, 通过构建相关理论模型、双边政治关系以及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指标, 采用多种稳健性检验回归分析发现: 双边政治关系对于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性, 对于扩展边际影响远高于集约边际; 与出口目的国文化距离越大, 双边政治关系对于文化产品出口影响越强; 进一步地, 在不同双边政治关系阶段, “政治关系趋热”能够显著促进文化产品出口, 而“政治关系紧张”对出口呈现一定的抑制效应; 同时发现, 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 要继续夯实与出口目的国交流合作, 充分重视两国间非正式和民间友好交流活动, 发挥其对于文化距离的弱化效应, 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进而带动中国文化对外贸易发展。

关键词: 文化贸易; 二元边际; 双边政治关系; 阶段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 F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19)05-0096-13

一、引言

2016年中国连续三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但与贸易大国形象形成强烈反差的是, 中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规模仍然相对偏小, 国际竞争力较弱^[1-2]。根据商务部统计, 2015年文化贸易总额仅为1 013.1亿美元, 占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6%, 体现文化贸易传统核心竞争力产品仍然处于逆差态势。因此, 如何促进文化产品出口增长, 破解中国文化产品贸易发展困境, 进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成为当前文化贸易理论和政策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

针对中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的研究, 较多从文化距离、制度差异、贸易壁垒等因素进行了分析, 即中国与出口目的国制度差异越小、文化距离越小, 越有利于双边文化贸易的发展, 同时也发现文化距离与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贸易成本正相关, 不利于双边文化贸易的发展^[3-4]。但是, 已有研究忽略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于文化贸易发展的重要作用。实际上, 双边政治关系作为国家、企业或消费者效用中的一部分, 可以通过影响交通、市场运行等直接影响贸易成本, 显著地影响两国经贸往来和发展, 而国家间政治冲突会带来贸易规模显著地下降^[5]。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 如果两国间双边政治关系呈现逐步优化的趋势, 则双边政府往往会采取积极增进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举措, 从

收稿日期: 2019-06-19; 修回日期: 2019-08-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化贸易出口竞争力的测度、影响因素与提升对策研究”(18CJY002)

作者简介: 杨连星(1989—), 男, 山东诸城人,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文化贸易; 沈超海(1986—), 男, 浙江台州人, 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证; 牟彦丞(1995—), 男, 山东烟台人,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投资银行兼并与收购。

而为两国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同时,日益密切的双边政治关系也会带动民间团体的合作交流,促进经贸活动的深入合作,进而引致政府签订诸多双边经贸领域的贸易投资合作协议。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与以往聚焦在文化贸易出口目的国特征不同,本文从双边政治关系视角,对于政治关系与文化产品贸易发展间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这可能是对既有文化贸易研究视角的拓展;第二,与以往采用宏观层面的文化贸易数据不同,本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的文化产品^[6],采用中国文化贸易产品层面数据,通过区分不同文化距离、不同政治关系阶段性特征以及核心文化产品种类,揭示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文化贸易影响的微观机制;第三,本文基于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视角,得到的一系列关于双边政治关系对一国文化贸易出口边际的影响效应,能够为厘清“政治、经济与文化贸易”的相互影响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相关结论也能为如何有效地推进文化产品贸易发展,提供一定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一) 文化贸易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中国文化贸易尤其是体现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贸易,面临较大的发展困境。但是已有研究往往着重于对出口目的国特征的分析,相关数据仍然采用国家或者行业层面,缺乏微观样本的研究。已有文献中,多数与传统货物贸易研究视角一致,基于引力模型探究文化产品贸易的一系列影响因素。从出口目的国的市场规模视角,国外学者 Nitsch^[7] 研究发现,出口目的国经济规模较大有利于延长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而国内学者曲如晓等^[8] 基于中国与八个主要文化贸易伙伴的 2000—2010 年文化产品贸易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产品贸易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能够有力地促进文化贸易规模的显著增长。此外,从两国之间贸易联系的角度出发,两国之间进行过贸易的前期联系将有利于两国后期贸易联系的展开^[9],国内学者杨连星和张杰^[10] 进一步研究发现出口目的国可以通过前期的文化贸易获取经验与信息,促进文化贸易的发展。

上述文献与货物贸易研究视角较为相似,后续研究针对双边国家的文化差异因素进行了分析,与出口目的国间的文化差异越大,即文化距离指数越高,对于中国文化产品贸易发展的抑制效应越强。在核心文化产品研究方面,臧新等^[11] 利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受文化距离和共同语言影响最大。韦永贵和李红^[12] 通过构建文化、地理和制度等三维距离指标分析也发现,文化、地理和制度三维距离均在一定程度上显著抑制了文化出口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地,国内学者樊琦和杨连星^[13] 研究发现,相似的宗教信仰、中华文化圈等可以显著提升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即文化距离的缩小有利于促进文化贸易的发展。但是,也有研究发现文化距离既对文化贸易发展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存在较大的机遇,田晖^[14] 通过对外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发现,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贸易发展具有双重影响,文化距离增加了贸易沟通成本与诚信风险,但有利于两国文化增进了解和产生兴趣,进而有助于形成新的文化优势。

从已有研究来看,相关研究仍然拘泥于出口目的国视角,如出口目的国的发展水平、市场规模、贸易距离、文化差异等等,而文化产品具有共享性和外部效应等特征,受文化和制度的影响十分显著,这可能导致既有的传统贸易理论并不适用于文化贸易分析^[15]。根据嵌入性理论,组织及其经济活动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受社会网络关系的制约^[16],而国际贸易根植于关联国家的社会网络,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政治制度、双边或多边经贸关系等,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双边贸易发展。因而对于文化贸易的研究,不仅需考虑经济因素、文化差异,还要考虑双边国家的政治关联这一重要因素的影响作用,显然已有文化贸易研究鲜有涉及。

(二) 政治关系与贸易的相关研究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有的研究认为,冲突降低贸易的原因在于国家对自身安全的考虑,由于担心冲突国从贸易中获得比自己更大的收益(转化为军事力量),对自身安全造成威胁,一国会倾向于减少与冲突国的贸易^[17]。

已有大部分研究聚焦在政治冲突与贸易影响方面,一般而言两国间的政治冲突包括战争军事冲突、领土争端、人权事件等三大方面,不同类型的政治事件均对两国贸易产生了显著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对于“国家间的政治冲突是否会损害经贸往来”这一逆命题的研究至今仍未达成共识。首先,在战争军事冲突研究方面,与大国相关的持续一年以上的战争会显著地降低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和水平,并且战争对国家间的贸易影响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伴随战争而来的贸易制裁,对于国家间贸易的负面影响更大^[18]。其次,与战争负面影响类似,双边政治冲突也会显著地降低国家间贸易水平和依赖度,政治冲突降低了两国贸易水平,而连续的政治冲突基本会显著抑制贸易的发展^[17]。

关于针对中国样本的双边政治关系与文化贸易研究,也得到了与既有文献相一致的结论。在研究较为广泛的政治冲突影响方面,徐奇渊和陈思翀^[19]采用中国与日本间的政治关系指数研究发现,中日关系基本符合“政冷经冷”的演变规律,尤其特定时期的政治冲突,影响更为显著^[20]。

三、模型和指标构建

(一) 理论模型

1. 模型设定

现有研究中关于双边政治关系与文化贸易二元边际的理论模型较少,本文借鉴 Conconi *et al.*^[21]的思路,建立一个简单的两期-两国-两产品理论模型。假设*i*国只有一个企业从事文化贸易,生产两种文化产品:产品1和产品2,可出口到*j*国。进一步,本文假设*i*国企业已经建立了向*j*国出口文化产品1的贸易关系。

在第一期,企业需要选择(1)继续向*j*国出口文化产品1,或者(2)建立出口文化产品2的贸易关系,或者(3)同时向*j*国出口文化产品1并且建立出口文化产品2的贸易关系,或者(4)不进行任何文化产品相关的贸易。

在第二期,假如企业没有建立文化产品2的贸易关系,那么企业的选择与第一期相同。假如企业建立了文化产品2的贸易关系,那么企业需要选择(1)继续向*j*国出口文化产品1,或者(2)继续向*j*国出口文化产品2,或者(3)继续向*j*国出口文化产品1和文化产品2,或者(4)不进行任何文化产品相关的贸易。本文假设企业在当期做决策时,唯一确定的信息是双边政治关系的好坏。企业关于需求市场的信息依赖于双边政治关系。

为了简化模型构建而又不失一般性,本文假设双边政治关系存在两种状态,好与坏。状态之间的转化遵循马尔可夫矩阵:

如果第一期双边政治关系良好,那么第二期双边政治关系继续良好的概率是 μ_g ,其余各项含义可依此类推,并且 $0 \leq \mu_g \leq 1$, $0 \leq \mu_b \leq 1$ 。

双边政治关系是否良好,将会影响*j*国对*i*国文化产品的需求。本文假设这种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双边政治关系良好时,*j*国对*i*国文化产品需求扩大;另一方面是双边政治关系恶化时,*j*国对*i*国文化产品需求存在不确定性的萎缩。具体来说,本文假设*j*国对文化产品*h*($h = 1, 2$)的需求函数为:

$$Q_h = \max\{\theta_h(a_h - b_h P_h), 0\} \quad (1)$$

在需求函数中,用 θ_h 来描述两国文化差异对文化产品需求的影响。假设生产出口1单位文化产品*h*,其成本为 c_h ,建立贸易关系的固定成本为 F_h 。固定成本只在初次进入市场时存在。

2. 第二期的企业决策

(1) 企业未在第一期出口文化产品2

在此情形下,如果企业选择建立文化产品2的贸易关系,那么企业关于文化产品2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_{P_2} (P_2 - c_2) \theta_2(a_2 - b_2 P_2) - F_2 \quad (2)$$

求解此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利润最大化时的价格、出口量以及利润为:

$$P^*_{.2期_2} = \frac{a_2 + b_2c_2}{2b_2}, Q^*_{.2期_2} = \theta_2 \frac{a_2 - b_2c_2}{2}, profit^*_{.2期_2} = \theta_2 \frac{(a_2 - b_2c_2)^2}{4b_2} - F_2 \quad (3)$$

根据模型假设, a_2 是根据第二期双边政治关系状态而变化。所以, 当第二期双边政治关系良好时, 最优化时的价格、出口量以及利润为:

$$P^*_{.2期_2} = \frac{\bar{a}_2 + b_2c_2}{2b_2}, Q^*_{.2期_2} = \theta_2 \frac{\bar{a}_2 - b_2c_2}{2}, profit^*_{.2期_2} = \theta_2 \frac{(\bar{a}_2 - b_2c_2)^2}{4b_2} - F_2 \quad (4)$$

当第二期双边政治关系不佳而第一期关系良好时, 最优化时的价格、出口量以及利润为:

$$P^*_{.2期_2} = \frac{(1 - \mu_g)\rho_2 \bar{a}_2 + (1 - \rho_2 + \mu_g\rho_2) \underline{a}_2 + b_2c_2}{2b_2}, Q^*_{.2期_2} = \theta_2 \frac{(1 - \mu_g)\rho_2 \bar{a}_2 + (1 - \rho_2 + \mu_g\rho_2) \underline{a}_2 - b_2c_2}{2},$$

$$profit^*_{.2期_2} = \theta_2 \frac{[(1 - \mu_g)\rho_2 \bar{a}_2 + (1 - \rho_2 + \mu_g\rho_2) \underline{a}_2 - b_2c_2]^2}{4b_2} - F_2 \quad (5)$$

当第二期双边政治关系不佳同时第一期关系也不佳时, 最优化时的价格、出口量以及利润为:

$$P^*_{.2期_2} = \frac{\mu_b\rho_2 \bar{a}_2 + (1 - \mu_b\rho_2) \underline{a}_2 + b_2c_2}{2b_2}, Q^*_{.2期_2} = \theta_2 \frac{\mu_b\rho_2 \bar{a}_2 + (1 - \mu_b\rho_2) \underline{a}_2 - b_2c_2}{2},$$

$$profit^*_{.2期_2} = \theta_2 \frac{[\mu_b\rho_2 \bar{a}_2 + (1 - \mu_b\rho_2) \underline{a}_2 - b_2c_2]^2}{4b_2} - F_2 \quad (6)$$

以上公式经过简单计算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 1: 当 $(1 - \mu_g)\rho_2 \bar{a}_2 + (1 - \rho_2 + \mu_g\rho_2) \underline{a}_2 < b_2c_2$, 并且 $\mu_b\rho_2 \bar{a}_2 + (1 - \mu_b\rho_2) \underline{a}_2 < b_2c_2$ 时, 即当第二期双边政治关系导致 j 国对文化产品 2 的需求足够小时, 企业不会建立文化产品 2 的贸易关系。

结论 2: 当 $F_2 > \theta_2 \frac{(\bar{a}_2 - b_2c_2)^2}{4b_2}$ 时, 即建立贸易关系成本足够高或者存在严重贸易壁垒时, 无论双边政治关系好坏, 企业都不会建立文化产品 2 的贸易关系。当:

$$F_2 < \min\left\{\theta_2 \frac{[\mu_b\rho_2 \bar{a}_2 + (1 - \mu_b\rho_2) \underline{a}_2 - b_2c_2]^2}{4b_2}, \theta_2 \frac{[(1 - \mu_g)\rho_2 \bar{a}_2 + (1 - \rho_2 + \mu_g\rho_2) \underline{a}_2 - b_2c_2]^2}{4b_2}\right\},$$

并且 $b_2c_2 > \max\{\mu_b\rho_2 \bar{a}_2 + (1 - \mu_b\rho_2) \underline{a}_2, (1 - \mu_g)\rho_2 \bar{a}_2 + (1 - \rho_2 + \mu_g\rho_2) \underline{a}_2\}$ 时, 企业会选择建立贸易关系, 出口文化产品 2。

结论 3: 两国文化差异导致文化产品互补性越大时, 也即是 θ_2 越大时, 企业会克服建立贸易关系的高成本或贸易壁垒而建立贸易关系。

另一方面, 企业如果继续出口文化产品 1, 那么其关于文化产品 1 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_{P_1} (P_1 - c_1) \theta_1 (a_1 - b_1P_1)。$$

相应地, 当第二期双边政治关系良好时, 最优化时的价格、出口量以及利润为:

$$P^*_{.2期_1} = \frac{a_1 + b_1c_1}{2b_1}, Q^*_{.2期_1} = \theta_1 \frac{a_1 - b_1c_1}{2}, profit^*_{.2期_1} = \theta_1 \frac{(a_1 - b_1c_1)^2}{4b_1} \quad (7)$$

当第二期双边政治关系不佳而第一期关系良好时, 最优化时的价格、出口量以及利润为:

$$P^*_{.2期_1} = \frac{(1 - \mu_g)\rho_1 \bar{a}_1 + (1 - \rho_1 + \mu_g\rho_1) \underline{a}_1 + b_1c_1}{2b_1}, Q^*_{.2期_1} = \theta_1 \frac{(1 - \mu_g)\rho_1 \bar{a}_1 + (1 - \rho_1 + \mu_g\rho_1) \underline{a}_1 - b_1c_1}{2},$$

$$profit^{* \cdot 2期}_1 = \theta_1 \frac{[(1 - \mu_g) \rho_1 \overline{a_1} + (1 - \rho_1 + \mu_g \rho_1) \underline{a_1} - b_1 c_1]^2}{4b_1}$$

当第二期双边政治关系不佳同时第一期关系也不佳时,最优化时的价格、出口量以及利润为:

$$P^{* \cdot 2期}_1 = \frac{\mu_b \rho_1 \overline{a_1} + (1 - \mu_b \rho_1) \underline{a_1} + b_1 c_1}{2b_1}, Q^{* \cdot 2期}_1 = \theta_1 \frac{\mu_b \rho_1 \overline{a_1} + (1 - \mu_b \rho_1) \underline{a_1} - b_1 c_1}{2},$$

$$profit^{* \cdot 2期}_1 = \theta_1 \frac{[\mu_b \rho_1 \overline{a_1} + (1 - \mu_b \rho_1) \underline{a_1} - b_1 c_1]^2}{4b_1} \quad (8)$$

(2) 企业在第一期已出口文化产品 2

在此情形下,企业已经建立了关于文化产品 2 的贸易关系,所以企业关于文化产品 2 的最优化问题为:

$$\max_{P_2} (P_2 - c_2) \theta_2 (a_2 - b_2 P_2) \quad (9)$$

当第二期双边政治关系良好时,最优化时的价格、出口量以及利润为:

$$P^{* \cdot 2期}_2 = \frac{\overline{a_2} + b_2 c_2}{2b_2}, Q^{* \cdot 2期}_2 = \theta_2 \frac{\overline{a_2} - b_2 c_2}{2}, profit^{* \cdot 2期}_2 = \theta_2 \frac{(\overline{a_2} - b_2 c_2)^2}{4b_2} \quad (10)$$

当第二期双边政治关系不佳而第一期关系良好时,最优化时的价格、出口量以及利润为:

$$P^{* \cdot 2期}_2 = \frac{(1 - \mu_g) \rho_2 \overline{a_2} + (1 - \rho_2 + \mu_g \rho_2) \underline{a_2} + b_2 c_2}{2b_2}, Q^{* \cdot 2期}_2 = \theta_2 \frac{(1 - \mu_g) \rho_2 \overline{a_2} + (1 - \rho_2 + \mu_g \rho_2) \underline{a_2} - b_2 c_2}{2},$$

$$profit^{* \cdot 2期}_2 = \theta_2 \frac{[(1 - \mu_g) \rho_2 \overline{a_2} + (1 - \rho_2 + \mu_g \rho_2) \underline{a_2} - b_2 c_2]^2}{4b_2}$$

当第二期双边政治关系不佳同时第一期关系也不佳时,最优化时的价格、出口量以及利润为:

$$P^{* \cdot 2期}_2 = \frac{\mu_b \rho_2 \overline{a_2} + (1 - \mu_b \rho_2) \underline{a_2} + b_2 c_2}{2b_2}, Q^{* \cdot 2期}_2 = \theta_2 \frac{\mu_b \rho_2 \overline{a_2} + (1 - \mu_b \rho_2) \underline{a_2} - b_2 c_2}{2},$$

$$profit^{* \cdot 2期}_2 = \theta_2 \frac{[\mu_b \rho_2 \overline{a_2} + (1 - \mu_b \rho_2) \underline{a_2} - b_2 c_2]^2}{4b_2} \quad (11)$$

3. 第一期企业决策

不同于文化产品 1,企业在第一期是否建立关于文化产品 2 的贸易关系受到第二期的决策以及相应的利润引导。给定第二期的决策,企业在第一期的决策问题可以分两种情况来讨论。

情形 1: 如果企业在第一期建立贸易关系就可以获得利润,那么企业必然在第一期建立贸易关系。

此时企业的决策问题等价于上一节中的最大化问题(1)。求解后可知,当

$$F_2 < \min \left\{ \theta_2 \frac{[\mu_b \rho_2 \overline{a_2} + (1 - \mu_b \rho_2) \underline{a_2} - b_2 c_2]^2}{4b_2}, \theta_2 \frac{[(1 - \mu_g) \rho_2 \overline{a_2} + (1 - \rho_2 + \mu_g \rho_2) \underline{a_2} - b_2 c_2]^2}{4b_2} \right\},$$

企业在第一期建立贸易关系后就可以获得利润,从而使得企业有动机在第一期出口文化产品 2。

情形 2: 如果企业建立贸易关系的成本 F_2 无法仅仅依靠第一期的最优利润来弥补,那么企业需要考虑两期预期利润之和是否可以弥补建立贸易关系的成本。

企业在第一期做决策时,只需要默认第二期的决策与预期利润是给定的。因此,当第一期双边政治关系良好时,其最优化两期利润的问题为:

$$\max_{P_1} (P_1 - c_1) \theta_1 (a_1 - b_1 P_1) - F_2 + \underbrace{\mu_g \theta_2 \frac{(\overline{a_2} - b_2 c_2)^2}{4b_2} + (1 - \mu_g) \theta_2 \frac{[(1 - \mu_g) \rho_2 \overline{a_2} + (1 - \rho_2 + \mu_g \rho_2) \underline{a_2} - b_2 c_2]^2}{4b_2}}_{\text{第二期预期利润}} \quad (12)$$

求解可以得到:

$$\begin{aligned}
 P^*_{.1期_2} &= \frac{\overline{a_2} + b_2c_2}{2b_2}, Q^*_{.1期_2} = \theta_2 \frac{\overline{a_2} - b_2c_2}{2}, profit^*_{.1期_2} = \theta_2 \frac{(\overline{a_2} - b_2c_2)^2}{4b_2} - F_2, \\
 profit^*_{.1期和2期_2} &= \theta_2 \frac{(\overline{a_2} - b_2c_2)^2}{4b_2} - F_2 + \mu_g \theta_2 \frac{(\overline{a_2} - b_2c_2)^2}{4b_2} + \\
 (1 - \mu_g) \theta_2 &\frac{[(1 - \mu_g)\rho_2 \overline{a_2} + (1 - \rho_2 + \mu_g\rho_2) \underline{a_2} - b_2c_2]^2}{4b_2} \tag{13}
 \end{aligned}$$

当第一期双边政治关系不佳时,其最优化两期利润的问题为:

$$\max_{P_2} (P_2 - c_2) \theta_2 (\underline{a_2} - b_2P_2) - F_2 + \underbrace{(1 - \mu_b) \theta_2 \frac{(\overline{a_2} - b_2c_2)^2}{4b_2} + \mu_b \theta_2 \frac{[\mu_b\rho_2 \overline{a_2} + (1 - \mu_b\rho_2) \underline{a_2} - b_2c_2]^2}{4b_2}}_{\text{第二期预期利润}} \tag{14}$$

求解可以得到:

$$\begin{aligned}
 P^*_{.1期_2} &= \frac{\underline{a_2} + b_2c_2}{2b_2}, Q^*_{.1期_2} = \theta_2 \frac{\underline{a_2} - b_2c_2}{2}, profit^*_{.1期_2} = \theta_2 \frac{(\underline{a_2} - b_2c_2)^2}{4b_2} - F_2, \\
 profit^*_{.1期和2期_2} &= \theta_2 \frac{(\underline{a_2} - b_2c_2)^2}{4b_2} - F_2 + (1 - \mu_b) \theta_2 \frac{(\overline{a_2} - b_2c_2)^2}{4b_2} + \mu_b \theta_2 \frac{[\mu_b\rho_2 \overline{a_2} + (1 - \mu_b\rho_2) \underline{a_2} - b_2c_2]^2}{4b_2} \tag{15}
 \end{aligned}$$

上述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 4: 企业如果预期能从两期中获益,即使第一期无法获利,企业仍将在第一期建立关于文化产品 2 的贸易关系,即 $profit^*_{.1期_2} < 0, profit^*_{.1期和2期_2} > 0$ 时,企业仍然会选择第一期出口文化产品 2。

结论 5: 当 $profit^*_{.1期和2期_2} < 0$ 时,企业将不会在第一期建立关于文化产品 2 的贸易关系。

4. 基于二元边际的分析

由上述结论,可以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1: 从二元边际的视角来看,当双边政治关系有所改善或者呈现改善的趋势,文化贸易的二元边际将会显著增加,尤其能够显著促进扩展边际的提升。

研究假说 2: 双边国家文化距离越大引致市场需求越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双边政治关系对文化贸易的影响。

研究假说 3: 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助于促进文化贸易二元边际的提升,但是双边政治关系不佳或者趋于恶化时,双边政治关系的促进效应会呈现弱化趋势。

(二) 计量方程构建

对于双边政治关系与文化贸易二元边际的分析,本文在上述理论模型基础上,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margin_{ij} = \beta_0 + \beta_1 pol_{ij} + \beta_2 cd_{ij} + \beta_3 religion_{ij} + \beta_4 A_{ij} + \eta_i + \lambda_i + \varepsilon_{ij} \tag{16}$$

$margin_{ij}$ 是本文构建的文化贸易出口的二元边际 - 集约边际 (*intensive*) 和扩展边际 (*extensive*)。本文参照 Bernard *et al.* [22] 研究,将文化贸易出口的集约边际定义为一年中文化产品出口的产品 - 国家关系对的平均出口额,扩展边际定义为一年中文化产品出口的产品 - 国家关系对的数量。

pol_{ij} 表示中国与文化出口目的国的双边政治关系。依据文献综述讨论,本文选取的双边政治变量如下:(1) 建交时间 (*diplomacy*): 代表中国与东道国外交关系的持续时间。(2) 友好城市 (*fcity*): 表示中国与东道国建立友好城市的状况。(3) 高层互访 (*visits*): 表示特定年份内两国政治领导人的互访情况。(4) 双边冲突 (*conflict*): 表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冲突情况。

cd 表示文化贸易出口目的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国家间文化差异因素对于经济发展、跨国合作与交流有着显著的影响效应,文化距离较小有利于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亲和力参数两种方法促进贸易的发展 [23]。

$religion_{ij}$ 指中国与出口目的国是否有相同的宗教信仰的虚拟变量,是反映文化亲近的指标之一,相同的宗教信仰意味着文化背景相同或相似,有助于文化产品的出口 [24]。

A_{j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time_{ijt}$ 指本文构建的产品(六位码) × 出口目的国 × 年份角度下的出口持续期指标。 $lgdp_{jt}$ 指以 2005 年不变价为基准的人均 GDP。 $ldist_{jt}$ 指出口目的国地理距离的对数, $land_{jt}$ 指出口目的国是否临海。另外,我们使用文化产品种类系列虚拟变量 η_i 以及年份系列虚拟变量 λ_t , 作为方程的固定效应。 ε_{ijt} 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 数据来源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6]的阐释,本文中文化产品是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包括核心文化产品和相关文化产品。其中,文化贸易出口目的国特征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相关贸易统计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1996—2013 年中国文化贸易的出口目的国主要分布在 188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占比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如德国、澳大利亚、韩国、英国和日本等等;相关文化特征、地理特征数据主要来源于 CEPII 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于文化贸易零值样本,并未进行相应剔除,即如果中国对某个国家在某年后开始进行出口,在考察期内某些年份未进行出口,那么本文仍将这些年份的零值保留,以保证本文回归估计为平衡面板,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实证估计中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模型估计分析

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国文化贸易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而导致本文估计存在内生性问题。Polachek^[25]通过构建包括政治冲突的贸易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政治冲突显著影响了两国贸易,而 Polins^[26]进一步构建包括贸易在内的政治冲突模型,发现存在相逆结果。从本文模型设定来看,由于双边政治关系以高层互访、友好城市、双边政治冲突和建交期限等多个代理变量来衡量,如果单纯地采用工具变量来解决上述解释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可能无法同时找到多个合适的工具变量。基于此,本文采用两步系统动态 GMM 估计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其中本文的各回归模型中 AR(1)、AR(2) 以及 Hansen 检验,均通过了 GMM 方法的检验要求,也说明了本文实证分析选择 GMM 估计框架可能具有的合理性。此外,考虑到本文模型设定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了膨胀方差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进行了检验,发现模型变量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1 是采用两步系统动态 GMM 估计结果。本文首先对于总体的文化产品贸易出口额($export$)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表 1 中(1)列和(2)列估计系数来看,双边政治关系对于文化贸易出口存在显著的影响,验证了本文理论模型的相关结论。具体而言,高层互访($visits$)、友好城市($fcity$)、建交时间($diplomacy$)估计系数基本显著为正,而双边政治冲突($conflict$)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利于双边各种具体规则的创造与完善,通过传递母国对某一东道国的政治偏好,进而降低中国企业贸易风险,促进企业文化产品出口。但是,两国发生政治冲突时,会导致中国企业面临较高的贸易成本和贸易摩擦,显著抑制了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

进一步基于文化出口二元边际的结构特征,来探究双边政治关系对于文化出口边际的影响差异,具体估计结果见表 1 中(3)列~(6)列。从表 1 估计结果来看,双边政治关系显著影响了文化出口二元边际,并且对于扩展边际的影响效应远高于集约边际,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 1。具体来看,高层互访($visits$)、友好城市($fcity$)、建交时间($diplomacy$)与文化出口二元边际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双边政治冲突($conflict$)与文化出口二元边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显著带动中国的文化出口规模和范围的提升,验证了“政治-经济-文化”间存在的互为影响效应,而两国间政治关系的恶化则会显著地抑制文化贸易出口。上述估计结果表明,中国与文化出口目的国国家较长时间的外交关系可使双边经济活动嵌入到特定的制度背景中,有利于双边其他各种具体规则的创造与完善,进而促进中国文化出口;高层互访可以为母国贸易企业提供一系列正式的贸易合约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传递母国对某一东道国的政治偏好,也会显著促进中国文化出口增长;民间各种商务组织和交流会极大促进友好城市间的经济合作,增强了双边信息的对称度、降低中

国企业贸易风险,进而促进企业文化出口。但是,两国发生政治冲突时,会导致中国企业面临较高的贸易成本和贸易摩擦,这会显著地抑制中国文化出口行为。

表1 模型基准回归结果(两步系统动态 GMM 方法)

变量	总体出口额		集约边际(intensive)		扩展边际(extensive)	
	(1)	(2)	(3)	(4)	(5)	(6)
<i>L. margin(export)</i>	0.103*** (4.02)	0.110*** (4.39)	0.519*** (27.89)	0.448*** (20.21)	0.799*** (89.02)	0.766*** (70.05)
<i>visits</i>	0.0523* (1.74)	0.0417 (1.40)	0.0557*** (7.39)	0.0479*** (6.16)	0.430*** (5.49)	0.293*** (3.74)
<i>fcity</i>	0.00848*** (4.24)	0.00635*** (3.32)	0.00598*** (13.64)	0.00655*** (14.60)	0.0472*** (11.68)	0.0587*** (13.42)
<i>conflict</i>	-0.0828** (-2.41)	-0.0795** (-2.33)	-0.0414*** (-7.48)	-0.0500*** (-9.54)	-0.169*** (-3.70)	-0.353*** (-8.07)
<i>diplomacy</i>	0.00420 (0.56)	0.0161** (1.97)	0.0136*** (7.11)	0.00874*** (4.41)	0.0342*** (2.89)	0.0794*** (5.28)
<i>cd</i>	-0.00563 (-1.45)	-0.00475 (-1.28)	-0.00517*** (-6.32)	-0.00640*** (-7.13)	-0.0196*** (-3.74)	-0.0204*** (-3.45)
<i>religion</i>	-0.613** (-2.45)	-0.567** (-2.45)	0.0202 (0.32)	0.0484 (0.77)	0.309 (0.66)	0.311 (0.56)
<i>time</i>	0.219*** (17.56)	0.261*** (18.42)	0.0161*** (5.47)	0.0130*** (2.98)	0.0548*** (2.71)	0.0394 (1.38)
<i>lgdp</i>	0.0403 (0.64)	0.00801 (0.13)	0.187*** (11.19)	0.212*** (12.49)	0.453*** (4.48)	0.496*** (4.06)
<i>ldist</i>	-0.119* (-1.71)	-0.0918 (-1.35)	-0.103*** (-5.89)	-0.172*** (-9.88)	-0.722*** (-3.80)	-0.905*** (-4.22)
<i>land</i>	-0.555*** (-2.77)	-0.734*** (-3.76)	-0.676*** (-11.91)	-0.723*** (-12.92)	-1.727*** (-5.02)	-2.720*** (-6.34)
<i>_cons</i>	8.091*** (7.61)	8.386*** (8.05)	4.533*** (15.11)	5.247*** (16.44)	3.090* (1.76)	2.095 (1.10)
产品种类	no	yes	no	yes	no	yes
年份	no	yes	no	yes	no	yes
AR(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AR(2)	0.752	0.714	0.383	0.437	0.183	0.137
Hansen/Sargan	0.125	0.137	0.214	0.219	0.114	0.119
N	8555	8555	8555	8555	8555	8555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为t值或z值。AR(1)和AR(2)检验的原假设H0为“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GMM估计的一致性要求差分方程不存在二阶或者更高阶的自相关,但允许存在一阶自相关,原假设下统计量服从标准正态分布;Hansen/Sargan检验的原假设H0为“工具变量过度识别”,若原假设被接受,则表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原假设下统计量服从正态卡方分布。

(二) 双边文化距离分样本估计

诸多研究表明,文化距离已经成为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可忽视因素,国家间文化差异因素对于经济发展、跨国合作与交流有着显著的影响效应,文化距离越小越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提高亲和力参数,促进贸易的发展^[24]。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分析不同文化距离,尤其是与出口目的国文化距离较大的样本,双边政治关系与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是否存在显著的影响效应。本文基于文化距离指数,将样本分为三类:较小文化距离(小于25%)、中间文化距离(25%~75%)和较大文化距离(大于75%),以厘清文化距离差异视角下双边政治关系对文化贸易二元边际间的影响。

表2是采用两步系统动态GMM方法不同文化距离估计结果。从表2中(1)列~(6)列来看,与基准估计结果一致,不同文化距离样本中,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显著地促进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增长,双边政治冲突则会显著地抑制文化产品出口增长,并且这种影响效应在文化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样本更为显著。从不同文化距离样本估计来看,双边政治关系对于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效

应,随着文化距离的增长而提升,即文化距离越大双边政治关系对于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也越大,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1,这与 Zhou^[23] 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这进一步说明,双边政治关系能够创造与完善各种具体贸易规则,提供一系列正式的贸易合约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传递母国对某一东道国的政治偏好,增强双边信息的对称度、降低中国企业贸易风险,进而降低双边贸易成本,提高双边贸易亲和力,降低了较高文化距离对文化贸易的不利影响。

表2 不同文化距离样本估计结果(两步系统动态 GMM 方法)

变量	集约边际(<i>intensive</i>)			扩展边际(<i>extensive</i>)		
	(1) 较小距离	(2) 中间距离	(3) 较大距离	(4) 较小距离	(5) 中间距离	(6) 较大距离
<i>L. margin</i>	0.358 *** (16.85)	0.386 *** (15.95)	0.436 *** (12.54)	0.827 *** (156.88)	0.567 *** (20.63)	0.255 *** (6.25)
<i>visits</i>	0.0985 *** (9.15)	0.0968 *** (9.86)	0.147 *** (5.26)	0.499 *** (8.54)	0.465 ** (2.33)	1.007 *** (7.56)
<i>fcity</i>	0.0142 *** (15.48)	0.0179 *** (3.20)	0.0397 *** (15.41)	0.0716 *** (21.45)	0.310 *** (16.54)	1.318 *** (14.38)
<i>conflict</i>	-0.00902 (-1.39)	-0.159 ** (-2.40)	-0.227 *** (-13.29)	-0.0180 (-0.90)	-0.00977 (-0.03)	-0.765 *** (-3.76)
<i>diplomacy</i>	0.00183 (1.51)	0.0369 * (1.74)	0.0565 *** (9.84)	0.0592 *** (3.53)	0.309 *** (16.73)	1.302 *** (8.89)
<i>cd</i>	0.0357 (1.52)	-0.0357 *** (-16.77)	-0.0430 *** (-6.15)	-0.341 *** (-11.99)	-0.411 *** (-9.74)	-0.896 *** (-5.15)
<i>religion</i>	-0.341 *** (-3.06)	-0.137 *** (-4.43)	-0.0529 (-0.09)	-3.173 *** (-7.63)	-5.178 *** (-3.89)	-12.33 *** (-3.17)
<i>_cons</i>	11.69 *** (19.30)	12.22 *** (19.47)	-2.934 (-0.99)	28.24 *** (15.24)	48.25 *** (9.04)	118.1 *** (5.57)
产品种类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R(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AR(2)	0.313	0.696	0.536	0.634	0.537	0.634
Hansen/Sargan	0.314	0.415	0.419	0.323	0.419	0.323
N	3028	4171	1356	3028	4171	135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为 *t* 值或 *z* 值。限于篇幅,本文对于其他控制变量未予报告。

(三) 双边政治关系阶段性特征的回归估计

与以往着重于研究战争或者特定的政治事件不同,本文考察连续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于中国文化贸易的影响。在已有针对双边政治关系阶段性特征的研究中, King *et al.*^[27] 对路透社的新闻报道进行信息提取和加工处理,得到了可以判定双边政治关系阶段性特征的指数变量。

与以往研究一致,本文将双边两国关系状况划分为“理想、较好、可接受、较差、差、恶劣”6级,分别赋值为5、4、3、2、1、0。基于本文判定的双边政治关系总体状况,与杜映昕^[28] 研究一致,本文将其分为不同的政治关系阶段进行分样本估计,具体将其分为:双边政治关系趋热(理想、较好)、双边政治关系趋冷(可接受、较差)、双边政治关系紧张(差、恶劣)三个阶段特征。

表3 是不同双边政治关系阶段性特征分样本估计结果,与基准估计一致,双边政治关系显著影响了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并且对于扩展边际的影响效应远高于集约边际,进一步说明了本文估计的稳健性所在,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3。具体来看,高层互访(*visits*)、友好城市(*fcity*)、建交时间(*diplomacy*)与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双边政治冲突(*conflict*)与文化产品出口

二元边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上述影响的系数绝对值随着双边政治关系的趋冷程度显著降低,尤其以“政治关系趋热”样本估计系数最大,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中良好双边政治关系对于文化出口规模和范围提升的带动效应。而在政治关系紧张阶段,双边政治冲突则显著地抑制了文化产品出口增长,即两国间政治关系的恶化对文化产品出口规模和范围增长,均呈现出显著的抑制效应。

表3 不同政治关系阶段性特征估计结果(两步系统动态 GMM 方法)

变量	集约边际(intensive)			扩展边际(extensive)		
	(1) 政治关系趋热	(2) 政治关系趋冷	(3) 政治关系紧张	(4) 政治关系趋热	(5) 政治关系趋冷	(6) 政治关系紧张
<i>L. margin</i>	0.193*** (6.77)	0.515*** (27.20)	-0.372 (-0.18)	0.547*** (11.35)	0.811*** (49.18)	-0.00956 (-1.13)
<i>visits</i>	0.199*** (6.66)	0.175*** (16.41)	0.134 (0.03)	4.629*** (101.21)	2.235*** (5.48)	0.921*** (5.50)
<i>fcity</i>	0.0576*** (13.11)	0.00492*** (7.20)	-0.130 (-0.02)	0.468*** (10.81)	0.0494*** (12.80)	-4.426*** (-31.69)
<i>conflict</i>	-0.295 (-0.02)	-0.141*** (-6.04)	-0.445*** (-6.29)	-3.343*** (-6.10)	-1.079*** (-3.56)	-5.171*** (-20.10)
<i>diplomacy</i>	0.0336*** (12.19)	-0.00360* (-1.91)	-0.0194 (-0.03)	0.147*** (4.09)	0.0615*** (5.82)	1.359*** (42.00)
<i>cd</i>	-0.0102*** (-8.09)	0.000452 (0.54)	-0.0756 (-0.02)	-0.0879*** (-3.94)	-0.0151* (-1.74)	-0.993** (-2.41)
<i>religion</i>	-2.082*** (-14.65)	0.0612 (1.17)	30.39 (0.02)	-15.12*** (-8.33)	-0.772* (-1.67)	16.102*** (32.26)
<i>_cons</i>	2.050*** (5.20)	4.949*** (15.94)	10.02 (0.02)	-19.58*** (-2.66)	1.559 (0.90)	121.4* (1.91)
产品种类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R(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AR(2)	0.211	0.192	0.316	0.314	0.137	0.321
Hansen/Sargan	0.124	0.105	0.119	0.113	0.109	0.203
N	2139	1247	582	2139	1247	582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为t值或z值。限于篇幅,本文对于其他控制变量未予报告。限于篇幅,对于阶段性特征的划分计算,可以跟作者索要。

五、稳健性检验

鉴于模型中的扩展边际变量是计数形式,因此,文化贸易出口的扩展边际的回归模型可设定为:

$$extensive_{ijt} = \beta_0 + \beta_1 pol_{jt} + \beta_2 cd_{jt} + \beta_3 religion_{jt} + \beta_4 A_{jt} + \et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17)$$

与基准计量方程式一致,*i*、*j*、*t*分别指示产品、东道国与年份。方程中 *extensive* 代表文化贸易产品 *i* 的扩展边际,分别采用了上述产品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两个指标。*pol* 为一系列双边政治变量, ε_{ijt} 为残差项。本文扩展边际估计采用负二项估计^①。

①对于估计方法选择,泊松回归需要假设被估计变量均等分散(即方差等于期望),而如果被解释变量存在过度分散(即方差大于期望),则要考虑更具有一般性的负二项回归估计。在本文中,文化贸易扩展边际方差是均值的4倍以上,因而采用负二项回归可能更有效率。同时,在本文采用随机效应面板的负二项回归中,过度分散参数 α 均在1%统计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H_0: \alpha = 0$),说明本文采用负二项估计具有合理性。

从表4估计结果来看,与表1基准估计结果一致,不论产品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扩展边际,高层互访(*visits*)、友好城市(*fcity*)、建交时间(*diplomacy*)与文化出口二元边际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双边政治冲突(*conflict*)与文化出口二元边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他关键变量估计中,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time*)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文化距离(*cd*)变量估计系数基本显著为负,即文化距离的存在对文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效应。上述具有稳健性一致的估计结果再次验证了双边政治关系与文化贸易扩展边际间存在的一系列复杂影响效应,同样验证了本文理论模型的相关结论。

六、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文化贸易微观

产品六位码数据,通过构建相关理论模型和文化贸易二元边际指标,对双边政治关系对文化贸易的影响以及相关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总体而言,双边政治关系显著影响了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并且对于扩展边际的影响远高于集约边际,其中,高层互访、友好城市、建交期限与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双边政治冲突则呈现显著的抑制效应;分不同文化距离来看,文化距离越大双边政治关系的促进效应也越大,这说明双边政治关系能够创造与完善各种具体贸易规则,提供一系列正式的贸易合约等正式的制度安排,提高双边文化贸易亲和力,降低文化距离对文化贸易的不利影响;分不同政治关系阶段特征来看,随着政治关系的趋冷,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也显著降低,尤其以“政治关系趋热”阶段双边政治关系促进效应最强,即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的持续能够显著地促进文化产品出口增长,而双边政治冲突变量在“政治关系紧张”阶段抑制效应最强。本文多种稳健性结果,也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相关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存在的政策含义主要有:首先,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要继续夯实与沿线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发挥其对于文化贸易的带动效应。为了弥补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短板”,要增强正式双边政治制度对中国文化贸易出口提供的隐性制度保障,提升中华文化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其次,要充分重视两国间非正式的政治关系和民间友好交流活动,积极创造有利的条件和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双边非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发展,要充分重视和发挥非正式民间组织的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扶持政策,促进相关东道国以及专业性行业交流协会的发展,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带动中国文化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此外,要继续发挥双边政治关系对于文化距离的弱化效应,带动与文化距离较大目的国的文化出口增长,有针对性地增强与文化距离较大的出口目的国双边政治的交流和合作,破解当前文化贸易发展面临的困境,带动文化贸易的出口。

表4 模型负二项回归面板随机效应估计结果(Xtnbreg-RE)

变量	产品层面扩展边际		国家层面扩展边际	
	(1)	(2)	(3)	(4)
<i>visits</i>	0.263*** (6.77)	0.232*** (6.17)	0.157*** (2.98)	0.142*** (2.77)
<i>fcity</i>	0.00327*** (12.38)	0.00309*** (12.08)	0.00386*** (7.89)	0.00343*** (7.33)
<i>conflict</i>	-0.0175*** (-6.41)	-0.0173*** (-6.63)	0.0680*** (4.32)	0.0611*** (3.60)
<i>diplomacy</i>	0.00140* (1.74)	0.000247 (0.32)	0.000478 (0.47)	0.000201 (0.19)
<i>cd</i>	-0.00192*** (-3.46)	-0.00178*** (-3.41)	-0.000373 (-0.51)	-0.000366 (-0.47)
<i>religion</i>	0.00267 (0.61)	0.00200 (0.48)	0.00470 (0.65)	0.00360 (0.44)
<i>_cons</i>	1.962*** (12.52)	2.049*** (13.93)	5.512*** (28.14)	5.267*** (24.66)
产品种类	no	Yes	no	Yes
年份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i>Hausman</i>	0.113	0.305	0.115	0.213
<i>lnalpha</i>	-2.325***	-2.498***	-1.014***	-1.091***
<i>N</i>	10472	10472	10472	1047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参考文献:

- [1] 陈勇兵,李燕,周世民. 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及其决定因素 [J]. 经济研究, 2012(7): 48-61.
- [2] 邵军,吴晓怡,刘修岩. 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期及影响因素分析 [J]. 世界经济文汇, 2014(4): 36-47.
- [3] 周升起,兰珍先. 中国文化贸易研究进展述评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1): 117-130.
- [4] 王洪涛.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成本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文化贸易出口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J]. 当代财经, 2014(10): 97-107.
- [5] DU Y, JU J, RAMIREZ C D, et al. Bilateral trade and shocks in political rel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some of it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1990—2013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108(9): 211-225.
- [6] UNESCO. International flows of selected 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1994—2003: defining and capturing the flows of global cultural trade [R]: Montreal: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2007.
- [7] NITSCH V. Die another day: duration in German import trade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9, 145(1): 133-154.
- [8] 曲如晓,杨修,刘杨. 文化差异、贸易成本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 [J]. 世界经济, 2015(9): 130-143.
- [9] BRENTON P. What explains the low survival rate of developing country export flows? [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9.
- [10] 杨连星,张杰. 进口如何影响了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7(8): 13-22.
- [11] 臧新,林竹,邵军. 文化亲近、经济发展与文化产品的出口——基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实证研究 [J]. 财贸经济, 2012(10): 102-110.
- [12] 韦永贵,李红.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文化、地理及制度三维距离的检验 [J]. 现代财经 (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6(10): 103-113.
- [13] 樊琦,杨连星. 文化特征对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12): 108-116.
- [14] 田晖. 国家文化距离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区域差异 [J]. 经济地理, 2015(2): 22-29.
- [15] GASHER M. Global television and fil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the business [J].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0, 25(2): 101-102.
- [16]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 [17] REUVENY R, KANG H. A simultaneous-equations model of trade,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11(2): 279-295.
- [18] LAMOTTE O. Disentangling the impact of wars and sanction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former Yugoslavia [J].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12, 54(3): 553-579.
- [19] 徐奇渊,陈思翀. 中日关系紧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J]. 国际政治科学, 2014(1): 1-24.
- [20] 杨攻研,刘洪钟. 政治关系、经济权力与贸易往来: 来自东亚的证据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12): 110-130 + 159-160.
- [21] CONCONI P, SAPIR A, ZANARDI M.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firms: from exports to fdi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99(3): 16-30.
- [22] BERNARD A B, JENSEN J B, REDDING S J, et al. The margins of US trad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2): 487-493.
- [23] ZHOU M. Intensification of geo-cultural homophily in global trade: evidence from the gravity model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1, 40(1): 193-209.
- [24] STRAUBHAAR J, VISCASILLAS G M. Class, genre, and the regionalization of television programming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1, 41(1): 53-70.
- [25] POLACHEK S W. Why democracies cooperate more and fight l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operation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5(3): 295-309.

- [26] POLLINS B M. Conflict, cooperation, and commerce: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interactions on bilateral trade flows [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9,33(3): 737 - 761.
- [27] KING G, HONAKER J, JOSEPH A, et al. Analyzing incomplete political science data: An alternative algorithm for multiple imputation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1, 95(1): 49 - 69.
- [28] 杜映昕. 国家间政治冲突对贸易的影响——文献综述及基于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实证研究 [J]. 经济学报, 2015(1): 124 - 144.

(责任编辑: 黄明晴; 英文校对: 葛秋颖)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on China's Cultu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Margin of Export

YANG Lianxing¹, SHEN Chaohai², MOU Yancheng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61,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61,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products trade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promoting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hina. Focusing on the important theme of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trade, this paper constructs relevant theoretical models,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dual margin of cultural exports indicators. Through a variety of robustness tests and analysis, it has found that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impact the dual margin of cultural products export significant differently. They have much higher impact on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cultural trade than the intensive margin. The greater the culture distance between home country and the export destination country, the stronger the influence of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on the export of cultural products. Furthermor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hot political relation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export of cultural products, while "tense political relations" has a certain inhibitory effect on export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olitic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export destination countries should be consolidated, informal and non-governmental friendly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b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weakening effects on cultural distance should be exerted, and Chinese culture should be vigorously promoted to go global, and thu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trade.

Key words: culture trade; dual margin;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features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